

0304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蔚县政协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蔚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ZA44/25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蔚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河北省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字数18.5万

1999年1月第一版

印数：1—1200册

冀出内准字（1999）第A033号

主 编：杨建军

编 辑：杨建军 春 雷

审 阅：黄绍雄 班 岭 袁文智

刘占勤 阮秉高

校 对：杨正海 周清溪 春 雷

赵清深 张启维 周万江

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目 录

视名利淡如水 看事业重如山

——记张苏的革命生涯张子儒 杨建军（1）

※ ※ ※

《蔚县民报》拾遗马 映（14）

《蔚县报》的创办经过周清溪（19）

忆《萝川摇篮》期刊任永才（25）

※ ※ ※

西合营师范概述苟登瀛（29）

《望南山》与西大云瞳惨案周清溪（33）

儿童团·小哨兵·秧歌队任永才（35）

※ ※ ※

推广速成识字法的回忆武新山（38）

回忆教育系统向党“交心”周清溪（45）

小学教师在“文革”中任永才（49）

※ ※ ※

昔日祭孔大典周清溪（53）

涂乘鲁与文昌阁高等小学堂任永才（55）

废除科举 兴办学堂

——民国年间的小学教育周清溪（57）

※ ※ ※

周淇候选“国大代表”的经过周清溪（62）

难忘的记忆马云集口述 周清溪整理（65）

※ ※ ※

王贞姐与民间刺绣	周清溪 (68)
下元皂灯节	苟登瀛 (71)
小有子及其高跷班	任永才 (74)
独树戏班及灵木头祁尚枝	任永才 (79)
东陈家涧元宵社火及摆灯碗	任永才 (84)
蔚州社火一绝——“活马舞”	张启维 (88)
蔚县第一次运动会追述	苟登瀛 (91)

※ ※ ※

蔚州大戏名伶“羊羔旦”	张启维 (95)
蔚州梆子名伶司永亮	杨建军 张启维 (101)
蔚州梆子名艺人张仲	张启维 (109)

※ ※ ※

我的宗教生涯及蔚县耶稣教的梗概

.....王献瑞口述 周清溪整理	(116)
暖瑞和尚纪略	马映 (121)
重泰古刹的“三教楼”	周清溪 (127)
雅静壮观的安乐寺	兰耀先 (129)
暖泉的佛镜	周清溪 (131)
老山寺及其临济宗徒众	李兆才 (133)
古朴典雅的弥勒寺	任永才 (136)
东陈家涧的泰山庙	任永才 (139)
县城寺庙知多少	周清溪 (141)

※ ※ ※

大蔡庄李氏家族概略	赵清深 (146)
-----------------	-----------

※ ※ ※

昔日农村贺号	任永才 (150)
民间庆寿概述	任永才 (152)

※ ※ ※

建国前的民间借贷	周清溪 (156)
----------------	-----------

蔚州老字号拾零	周清溪 (160)
升恒泰钱铺	(160)
文泰锦绸呢绒国货庄	(162)
县城德成当	(164)
建国前后的蔚县石油商业	周万江 (168)
※ ※ ※	
古蔚概况	苟登瀛 (179)
蔚州“三奇”	周清溪 (181)
南柳河口“三景”	苟登瀛 (183)
※ ※ ※	
蔚县昔日“三毒”	周清溪 (185)
人祸	苟登瀛 (192)
民国间蔚县城娼妓一瞥	
..... 韩素卿 毕如仲 口述 王玉祥整理	(197)
县城的娼妓概述	(197)
娼妓业的清规戒律	(200)
老鸨的凶残 妓女的遭遇	(203)
妓女生涯三十年	(207)
妓院的骗局	(211)
妓院的枪声	(213)

补白资料页次

对国人的一般称谓(18) 中国朝代名称的由来 (一)(24)
 用“四”表示的名人(28) 用“三”表示的名人(32) 世界
 五大凯旋门(37) 什么是唐三彩(44) 乒乓球何时传入中国
 (48) 月的雅称(56) “三教九流”指哪些人(61) 最大
 的百科全书(64) 春节的由来(67) 中国的代称(70) 中
 国朝代名称的由来(二)(78) 尹耕与《塞语》(83) 趣味
 常识“五”(90) 蔚州仓廩(100)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

“洋名”(126) 河的不同称谓(128) 台湾名称的由来(132)
现存最早的故事片(135) 我国体育影片之最(138) 民间崇拜
的各行祖师(145) 世界十大军事论著(155) 世界五大宫殿
(167) 明清科举制度(178) 元旦与年(191) 传播新学
者阎主诚(196)

视名利淡如水 看事业重如山

——记张苏的革命生涯

张子儒 杨建军

张苏，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战斗了60多个春秋，奉献了自己光辉的一生。



张苏，学名张希贤，曾用名张若增、张伯高、张更生，后将“更生”合成“甦”，又由“甦”字谐音变成“苏”，建国后，“苏”字成了他的常用名。

张苏1901年10月20日出生于河北省藁县南洗冀村。他生性聪颖，从小随清朝廪生、教私塾的祖父认字，颇得祖父喜爱，父亲成丁即出门学做生意，家人遂期望张苏成就大器，光宗耀祖，随即送他读私塾、念小学、上中学。

正在张苏成长求学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新文化运动为中国传播新思想开辟了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五四运动震撼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领导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已成必然趋势。张苏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军阀混战、支离破碎的中国命运担忧，对黑暗社会制度愤慨，对民众的苦难十分同情。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难，他于1923年8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大学期间，他积极投入了学生爱国运动

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7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张苏大学毕业后，1927年7月在北京三中任教，同时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28年4月任青年团北京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后来青年团北京市委遭到破坏，张苏亦遭通缉。多亏三中校长冒死相助，张苏脱离虎口，避难于宣武门观音寺公寓里。在此，他结识了1925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当时称民国大学）女学生齐淑容（又名齐笑尘），并产生了爱情。但他们以党的工作为重，致力奔波于革命事业，经过长达21年的“马拉松式”的传奇相恋，于1949年才结为伉俪。

同年6月，根据党的指示，张苏秘密潜出北京，转移到陕北榆林中学任教。是年底，蔚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上书省教育厅，举聘张苏回蔚县任教育局局长。张苏征得党组织的同意，接受了邀请，于1929年1月，从陕北榆林回到蔚县，担任蔚县教育局局长。

张苏怀着思乡的游子之情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土家乡。而家乡却是：“百里县境不见笑，随处唯闻苦吟声”的一片凄凉景象。这一切引起张苏对家乡民众的极大痛心。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富人们吃遍了人世膏粱，隐士们享尽了山野风味……穷小子忍不住寒与饥。”惨痛、苦难、悲愤在张苏心中交织在一起。为了唤起民众，他利用担任教育局长的公开身份，在蔚县城乡，或亲自登台演讲，或与进步人士接触交谈，在教育界开始了马列主义的宣传，介绍苏联十月革命情况，揭露黑暗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从而唤起了一些仁人志士的爱国热忱，激发了热血青年的革命意念。张苏成为在蔚县宣传马列主义的第一人，为中共党组织在蔚县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察南地区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苏大力整顿蔚县的教育现状，大刀阔斧地割弊兴利，扫除陈腐，使蔚县的教育状况迅速转机。为了造就人才，他把原来二年制的蔚县师范讲习所，从县城迁到西合营，避开当局的监视，

改办成三年制的蔚县西合营师范学校。为了充实师资队伍，张苏介绍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任教，更新了教学内容，增设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社会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军事操等。同时，他还积极筹款赴北京、上海等地购买革命书籍，办起了教育图书馆和各区流动书库。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马列主义论文和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普罗文学开始介绍到蔚县，吸引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一时出现了阅读革命书籍热，打开了他们推翻旧制度，向往新革命的眼界，为蔚县第一代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进行了启蒙教育，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

1929年春，正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18周年之际，张苏思绪种种，感慨万千，忿然写了《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诗，诗中写道：“……生命非不贵，为正义而牺牲方不无味；赤血非不贵，为人民横流才有意义！”“为正义”“为人民”是张苏的品格和情怀，也是张苏对人生价值的执著追求。这年年底，新军阀阎锡山向晋、察、绥、冀、热华北5省发行“编遣库券”。阎锡山欺弱凌危，分配很不公平，给经济贫困的察哈尔省分配的数额，按人口平均比山西省多一倍，察哈尔省的人民叫苦连天，极为愤慨。面对阎锡山的残酷掠夺，张苏征得中共北京市委的同意，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联络各县教育局长及开明人士和各界代表，到察哈尔省政府为民请愿。恰在这时，张苏接到了北平齐淑容的来信，邀他为她们的《地球》刊物撰写文章。他欣然命笔，以“塞上客”为笔名，挥毫写了2000多字的《编遣库券是骗钱苛捐》文章发表。经过一个多月反对“编遣库券”的说理斗争，在众愤难抑的情势下，察哈尔省主席杨爱源被迫减了三成摊派，并争得不用银洋用山西票子交纳，实际上为察哈尔人民减轻了一半负担，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

张苏的行动大大激怒了当局，新任县长孙克信认为张苏是他仕途上的克星，升官路上的障碍，便无中生有的给张苏罗织罪名进行诬告。妄陈张苏带头组织抗捐，兴风闹事，是到省府请愿的主谋；在蔚县搞赤化宣传，蛊惑人心，煽动民变，可能是共产党

等等。张苏对当局的卑劣行径采取先发制人、针锋相对的策略，以防节外生枝。一天，张苏从容不迫地突闯县政府面见县长，对县长声色俱厉地说：“你不是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吗？我自动投案来了，免得你们兴师动众，费心劳神！”县长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不知所措，假惺惺地说：“张公何出此言，万不可听信谣传。”张苏整整一天呆在县长面前反复表示：“我是投案来的。”县长大窘，最后不得不求人请来张苏敬重的老师前来劝说，这才使他下了台阶。

鉴于张苏在蔚县的处境，1930年3月中共北京市党组织指示他悄然离开蔚县，南下到浙江温州第十中学任教。张苏虽然离开了蔚县，但他在蔚县播下的革命种子生根发芽，日益茁壮起来。西合营师范学潮不时发起，在每次学潮中，学生遇到难题或挫折，都写信给远在南方的张苏老师，请求指教和帮助。张苏虽远离蔚县，仍时时萦怀西师师生，对西师学潮中的师生命运十分关心，曾5次写信给全体学生，对他们进行教诲和鼓励。1931年6月，西师学潮，遭到了当局的镇压，进步师生被逮捕，还声言张苏是西师闹事的主谋，断定他是共产党人。省政府旋即下令通缉张苏。张苏无法在温州活动，只得另谋去处。

1931年7月，张苏奉党组织指示，从浙江温州来到张家口开展教育工作。刚暂住在一家旅馆里，即被原蔚县国民党部主任马孝贤告了密，张苏被捕入狱。在狱中，张苏大义凛然，不为威胁和利诱所动，严词斥敌：“本人一向办教育，从不过问政事，又不鸡鸣狗盗，何故拘张某于监禁，岂不有欺于天下？”当局无言以对，拘押4个多月后，因无真凭实据，允张苏取保释放。

飞出樊笼的张苏，于同年12月到河北大名第七师范学校任教，并在这个当时被称为河北南部白色恐怖下的革命策源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传播马列主义。他在国文课中，实际上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灌输的是革命思想，对学生影响很大，为后来一大批革命者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2年8月，张苏离开大名七师，先后到河南焦作道清铁路

局、焦作工学院高中部做秘书工作和高中语文教员。1933年5月后，张苏离开焦作北上，参加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冯将军被逼下野，张苏留在张家口，就任了张家口私立塞北中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将领蒋光鼎、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筹备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举起义旗，宣布反蒋抗日。张苏奉命赴闽，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初创工作。由于蒋介石的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不久遂告失败。张苏又重返北方，到察省第二中学（即宣化二中）任教。

1934年，张苏在宣化二中同中共地下党员林枫、张致详、张伯园等密切合作，利用国文教师身份，在学校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组织课外读书会，引导学生走救国之路，在学生中建立起第一个党支部。1935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宣化二中，全校师生群情激愤，纷纷响应。期间，张苏虽未公开参加学生活动，但他日夜操劳，指导学生掌握斗争策略和方向。二中学生以罢课、游行、集会宣传等形式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察省当局惊慌失措，采取提前放寒假、开除进步学生等手段制止事态扩大。张苏等也被学校解聘。迫于形势，张苏等离开宣化二中，但他们在宣化二中播下了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同时他们在宣化人民心中也留下了难忘的形象。

1936年2月，张苏奉命到北平女中任教，在党内担任文化总盟书记。后又调至北平商业学校和北平二中任教，继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37年3月，受党的派遣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通过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杜某，从事与西北军的联络工作，奔走于西安与延安。从此，张苏离开了教育界，开始了公开从政的生涯。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苏同志随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离开西安，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投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

民主政权的创建工作。9月，国民党29军即将南撤，蔚县尚未失守，由我八路军去接防。周恩来沙场点将，任命张苏当蔚县县长。张苏尚未赶到就任，蔚县已经失守。此后张苏随八路军115师奔赴抗日前方，八路军打到哪个县，他就是哪个县的县长。从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到1938年1月，张苏先后任阜平县、蔚县、涞源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并担任蔚县、涞源、灵丘、广灵、浑源、阳原、易县7县行政委员会主任。张苏每到一个刚收复的县做县长，都是招抚流亡，安定人心；减租减息，废除苛杂；实行乐捐，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还要搞统一战线，组织民兵，配合部队打仗等，连吃饭、走路也考虑工作。1938年2月，张苏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实业处长，同时担任冀西区行政公署主任。

张苏在抗战初期身兼数职，一切工作有条不紊，许多事情都是事必躬亲，不仅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但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极大的恐慌和仇视。1938年6月29日，日本驻蔚县警备司令官挖空心思，给张苏写了一封所谓《劝告张希贤书》，对张苏进行诱劝、威胁，而且竟称“日本对华是广行仁义”，并写明了联络暗号、投降路线和接应地点，扬言如不投降定要抄斩全家。张苏毫无惧色，正气凛然，以“大中华民国抗日战士张希贤”的署名，写出《答日本伪蔚县警备司令官书》。他提笔如握枪，满腹的怒火化作一腔仇恨泻于笔端，历数日寇“扰乱东亚之安定，破坏世界之和平。……鲸吞中华之广土，尽奴中华之众民……奸淫掳掠，焚烧屠杀……”的罪行，严厉警告日本侵略者：“应告为此不仁不义之军阀，即日悔祸撤兵。日本蕞尔小国，介乎两大之间，必欲其螳臂，以与中国为事，即无黄雀窃乘其后，必有革命爆发乎中！欲为日本深谋远虑者，当一反军阀之所为也。”“日本欲祸他人之国，反祸其国，阁下所以伤心落泪，殆为此乎？敬告尔众，其速来归，我不杀俘，昆弟遇之。”最后表示：“老夫傲骨天成，不为物移，度外生死，浮云富贵，但求为国捐躯，此外不暇计也。我有财产，任尔没收，我有妻室，任尔杀戮。阁下

之苦口婆心，但博老夫一笑耳。”根据聂荣臻指示，这篇檄文8月发表于《抗战报》上，铮铮铁语，如匕首，似投枪，使日寇目瞪口呆，同时极大地鼓舞了晋察冀边区广大军民的抗战激情。

1938年春到1943年春，张苏主管晋察冀边区经济建设工作，提出了“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决定一环，离开生产就谈不到经济”的边区建设指导思想，领导各县垦荒修滩，修复良田，发展养殖业，提出“一人一鸡，五人一猪”的口号等。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一道工作的同志，并且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注重科学技术，支持陈凤桐等农业专家，在边区办了七八处农场，推广作物杂交、合理施肥等技术，极大地支援了前线的粮食供给。他动员、组织干部群众，就地取材，办了许多小型厂矿，生产制造了军民急需的物品，在阜平、灵寿、唐县、行唐、宁晋等县办起了造纸厂，缓解了边区严重纸荒的问题。他组织太原兵工厂撤到五台县的部分职工，成立了边区制造所，用土法炼磺、熬硝，从民间收集废铁，逐步解决了当时军队急需的手榴弹供应问题。他领导边区实业处接办阜平炭灰铺煤矿、曲阳县灵山煤矿，解决了炼铁用煤的问题。由于张苏出色的工作，打破了日寇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聂荣臻给予他中肯的评价：“张苏同志后来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他工作很认真，很踏实，为巩固边区抗日政权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建立察哈尔省。1945年11月，张苏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委员、省政府主席。他作为第一批民主政权的省主席，全面领导察哈尔省进行民主政权建设工作，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支援解放战争，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反奸除霸，清算复仇，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动员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恢复生产，净化社会环境，使全省各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9月，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边区首府张家口和察省会宣化城。张苏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兵慌马乱中，亲临第一线，指挥防空，组织撤退。1947年11月，冀晋行署和察哈

尔省合并为北岳区，张苏任北岳区党委委员、行署主任兼财经办事处主任。他领导广大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发展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为支援解放战争，征集、调动了大批财力、物力和人力。1948年，张苏在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张家口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时，组织接管国民党“察哈尔银行”、“中央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中国农民银行张家口分行”，对10家私人银号、12家金店、2家信用社进行了调查清理；同时接管报社、电台，宣布法币废止使用；等等。在他的领导下，张家口迅速建立了革命秩序，恢复了生产，发展了经济，有力地支援了平津战役的胜利。

1949年1月，察哈尔省重建，张苏再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又兼任省府财经委员会主任。战后的察哈尔省，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张苏团结省委一班人，动员、组织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商业，清除社会渣滓，禁绝毒品，查封烟馆、妓院、赌场，肃清匪特及国民党的残余，为察省国民经济恢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9月，全省大面积遭灾，人民罹难，张苏深为忧虑，亲赴重灾的张北、崇礼、蔚县等地视察，慰问灾区人民，指挥生产自救，鼓励人民战胜灾害，渡过难关，并及时为灾区调拨了粮食、物资，极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张苏同志是察哈尔省卓越的领导人”，这是察省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评价。1952年1月后，张苏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行政委员会，先后任华北局委员、常委、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院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位高权重对张苏来说，只是加重了肩上的担子和责任。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各级政权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

从1954年起，张苏转到政法战线工作，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机关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务。1963年11月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他在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时，积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共财产，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担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组织、审查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交付的各项法律、法令，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尽职尽责。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期间，对召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历次会议以及为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行使职权、为起草刑法、民法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工作。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副检察长期间，张苏尤其着重抓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政法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实现了党中央关于“捕人少，治安好”的要求，1965年捕人数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而社会治安达到历史上的最好状况。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苏同志受到诬陷和迫害，从1966年8月到1978年2月，蒙受长达11年半的批斗审查。期间还在湖北沙泽镇鸡鸣嘴农场，渡过了3年多的“劳改”生涯。尽管命运多蹇，年近古稀，但他一身正气，胸襟坦荡，不畏邪恶，对党忠诚不渝。粉碎“四人帮”后，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在“文革”中对自己有过激行为的人，他宽宏大度，不计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一切向前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心底无私”的博大胸怀。

1978年2月，党中央为张苏彻底平反，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检察机关重建后，77岁高龄的张苏再次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他百倍珍惜党中央再一次给他 的工作机会，同党组同志一道，总结建国以来检察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确定新时期检察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积极投入检察机关的重建和检察工作的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自1978年6月恢复办公以来，张苏同志分管研究室和信访工作。他不顾年老体衰，率先垂范，倾全力抓信访。在他的带动下，检察机关的信访工作搞得有声有